

一说到小吃，很多北京人第一时间都会想到卤煮火烧。这是用猪的小肠、肺头、炸豆泡、两三片五花肉和切了块儿的大火烧，以卤汤熬制出来的美味。小肠的柔韧，肺头的软烂，老汤的香浓，动物内脏的油脂，重口味的刺激，简单粗暴式的好吃，让人有一种极强的满足感。北京人讲话，这才搪口。在旧时，卤煮火烧一直是底层社会解馋的“穷人乐”，但它的问世，却有乾隆皇帝的一份功劳。



卤煮火烧 流传到民间的宫廷风味

乾隆御厨研创苏造肉

据说卤煮火烧的雏形是苏造肉，不过从御膳房流入民间的时候，吃肉在那个年代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还是奢侈的消费，于是就有人用猪的内脏和炸豆泡替代了猪肉，引得人们纷纷用它来打牙祭，便是现在的卤煮火烧。

苏造肉只存在于文字的记载，晚清民国时的《燕都小食品杂咏》里记载：“苏造肉者，以长条肥肉，酱汁炖之极烂，其味极厚，并将火烧同煮锅中。”据1998年版的《北京小吃》一书中记述，苏造肉是以丁香、官桂、砂仁等九味药料配成的药包进行卤煮的，旧京时，在什刹海一带的饭馆和东安市场内的“景泉居”出售。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苏造肉在市面上渐渐绝迹了。

在清朝灭亡不久的1915年，《清代野史大观》一书问世，其中的一则笔记便谈到了乾隆皇帝与苏造肉的故事，说当年皇上下江南的时候，有地方官员特意进献厨师张东官到行宫，

为乾隆做苏州菜，皇上吃后龙颜大悦，之后便把张东官带回北京。后来张东官在御膳房用不同的香料烹制猪肉，由于他是苏州人，因此这道菜也就被称为“苏造肉”了。之后苏造肉流出宫外，民间有人就在东华门外售卖，由此流传。

清代宫廷自乾隆以来，皇帝每日的饮食都有档案记录，除了每餐饮食的菜品名字，还时常记有当天做菜厨师的名字。在对众多文献的爬梳中，我终于找到张东官与乾隆皇帝的联系。乾隆三十年，皇帝南巡，二月十五日这天，苏州织造普福进献了自己的家厨为皇上添了几道江南风味菜，这当中便有张东官。在之后的南巡期间，张东官一直频繁地出现在皇帝的膳单当中。而在南巡之后，他依然忙碌于皇宫的御膳房，从乾隆三十年到乾隆四十八年，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，可谓“炒勺不辍”，他为皇帝献上的菜肴，诸如“酒炖鸭子”“肥鸡酒炖东坡”“酱汁肉”“春笋盐炒鸡”等等。

苏造肉是张东官研创比较晚的菜品了，第一次出现在宫廷膳单中是乾隆四十八年。《圆明园膳底档》中记载这一年正月二十八，皇帝在圆明园的九州清晏进晚膳，在众多菜品当中，就有苏造鸭子、肘子、肚子、肋条肉攢盘一品和苏造肉一品，并缀有小字“系张东官做”，此后苏造肉便经常出现在各位皇帝的餐桌上。

京菜汇聚各地风味

有了张东官和苏造肉这样的关键证据，基本可以确定卤煮火烧的风味由江南进入宫廷，再由宫廷流向民间的流通过程。而卤煮火烧的故事并不简单，绝不只是印证了一则民间传说而已，它背后的这种饮食交融的过程在北京的日常生活中很具有代表性，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北京饮食的特色。

北京最著名的烤鸭，与明清两代皇帝都有着紧密的联系。北京烤鸭有两大派别，一派是焖炉烤鸭，一派是

挂炉烤鸭。焖炉烤鸭源于南京烧鸭，明初永乐迁都时，随着大量迁徙的商贾进入北京，成为北京烤鸭的鼻祖；挂炉烤鸭源于清代宫廷的满族饮食，御膳房中有挂炉局这一机构，专门负责为皇帝烤猪、烤鸭，后其挂炉烧烤的方式流入民间，成为现今最为普遍的烤鸭方式。

帝王与宫廷只是众多影响因素中的一方面，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是封建社会选拔人才最重要的机制，让北京汇聚了天下大量的文人士子，他们在这里长期居住、往来交流，也给这个城市的饮食风味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。仅清末民初时宣南一家名叫广和居的饭馆，便有大量来自各地的士大夫，按《北京往事谈》和《燕京乡土记》的说法：“当时京官中有些善于烹调的南方人，多向该馆传授心法，制作一些特殊的菜。”如“赛螃蟹”，即江苏宜兴籍京官任凤苞授予广和居；如“烧烩爪尖”，即江苏苏州籍京官陆润庠授予致美斋……乃至民国初年，当时的饭馆还有个名菜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传授的，名曰“胡适之鱼”。正是这些来自于五湖四海的社会精英，使北京饮食得到了极大的丰富，京菜虽还算不上一个菜系，但它汇聚全国各地风味的特色，也使其在中国的众多美食中独树一帜。

摘自《新华每日电讯》 杨原/文

■史海钩沉

地铁新机场线将北延至丽泽商务区，“丽泽”之名源自800多年前金代中都城丽泽门。

据《丽泽书院史话》载：“‘丽泽’二字出自《周易·兑卦》：‘象曰：丽泽兑，君子以朋友讲习。’‘丽’有连的意思，兑为‘泽’，上下皆兑，有两泽相连，互相滋益之象。结合人事，朋友互相讲所不明之理，习所不熟之理，也可双方互相滋益。”

北宋崇宁元年（1102年），宰相蔡京以大兴豪华宫殿，取媚于徽宗赵佶，扩建都城汴京（今开封）的延福宫。该宫原来在皇城内后苑西南部，是一座普通的建筑，此次扩建将其移至大内拱辰门外，建筑规模宏大，徽宗赐名“延福宫”。其东门因朝向东方，为最早迎来朝阳之门，称“晨晖门”。而西门不远处有二湖以桥相隔，故以《易经》聚朋论道之典故，取两泽相连，其水交流如君子交流学问之意，称“丽泽门”。北宋著名思想家、文学家王安石题有《丽泽门》诗，赞誉其

“丽泽门”

溯源

门之景致：“丽泽门西日未俄，水明沙净卷纤罗。绿琼洲渚青瑶嶂，付与诗工敢琢磨。”

金皇统九年（1149年），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之孙完颜亮发动政变，杀死熙宗后登上皇帝位，史称“海陵王”。天德三年（1151年），他以上京“僻在一隅，官艰于转输，民艰于赴诉”为由，决定将国都从上京（今黑龙江阿城）迁至燕京（今北京）。贞元元年（1153年）改燕京为中都，并任命尚书右丞张浩和燕京留守、大名尹卢彦伦等仿北宋都城汴梁（今开封）的规制兴建新都，即在辽南京的基础上向东、南、西三面扩展，增修宫殿，扩大皇城范围，并采取外城、内城、宫城回字形

相套的布局。

据《北京城史话》载：金中都外郭城的东南角在四路通，东北角在今宣武门内南翠花街，西北角在今军事博物馆南皇亭子，西南角在今丰台区凤凰嘴村。外郭城东、西、南各开3个城门，北城垣有4个城门，共13座城门。东侧各称施仁门、宣曜门、阳春门；南侧各称景风门、丰宜门、端礼门；西侧各称丽泽门、颢华门、彰义门；北侧各称会城门、通玄门、崇智门、光泰门。其中西侧的丽泽门位于南端，其建筑形式及名称完全是仿照汴京城延福宫西侧的丽泽门。

金中都在历史上仅存在了62年，贞祐三年五月初二（1215年5月31日），中都被蒙古军队攻陷，城池遭受毁坏。元取金中都后于至元四年（1267年）在距旧都城东北三里处修筑新都，称“大都”。多年后中都旧址废为郊野，踪迹几无。

明嘉靖年间在金中都北侧会城门旧址一带形成村落，称“会城门村”，

由此金中都13个城门之名除这一个被沿用外，其他12个城门之名均消失。

有关丽泽门所处的位置，存在一定争议，经过地理学家多方考证，最终在马连道水源四厂北侧找到了丽泽门的遗址。这个位置与《金史·志第十六·礼八》中“泰和六年（1206年），诏建昭烈武成王庙于阙庭之右，丽泽门内”的记载大致相符。

1991年11月，在西三环南路与丰台北路交会处，建成了一座不完全互通式双层立交桥，长83.5米，宽29.2米，因大致邻近历史上金中都丽泽门的遗址，故称“丽泽桥”，由此使一个消失了700多年的老地名得以恢复。1999年9月，在丽泽桥与菜户营桥之间修建了连接西南二环、西南三环的城市主干道——长2.9公里、宽80米的“丽泽路”。以丽泽路为主线，也就是在金代中都城丽泽门遗址所处的大致位置，北京新兴金融功能区——丽泽金融商务区正逐步成形。

摘自《北京日报》 户力平/文